

第二部
超越绝望



九日文学网
www.krzzjin.com

九日文書
www.krzzjin.com

第三章 虚脱：疲惫而绝望

尽管美日两国曾共同陷于最严酷的战争境地，但在日本人看来，到 87 达东京湾的美国人，仍然像是来自不同星球的异类。不管是过去的经验还是未来的前景，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都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国人，洋溢着自豪和自以为是的信心，满怀着对美好未来的计划，却遭遇到了这样的民众——借用敏锐的观察者和学者鹤见和子机智的话语来说，就是曾经历过强烈的“全社会性的死亡”的日本民众。

对于美国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 1941 年 12 月，结束于三年零八个月之后。与此大不相同的是，对日本人来说，战争开始于 1931 年的征服“满洲”，并在 1937 年扩大为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日本人的战争之弦已经紧绷了 15 年。而在他们的处境越来越绝望之际，最初仅针对年轻士兵要奋战到死的教化，逐渐扩大为狂热而盲目地动员全民进行最后的自杀式战斗。“一亿”日本人都将为保卫神圣的国土而死，正如忘我的“神风特攻队”（“二战”中日本的空军敢死队）年轻飞行员所做的那样。正如左翼批评家荒正人所说，“要确保善男善女们，一旦宣布无条件投降，立即自觉自愿地集体自杀”。或者，如果不自觉自愿的话，至少要消极服从。像他们远在海外的战士一样，除了可能战斗到死，后方的民众很难想象自己的未来还有任何其他的可能。¹

在这种毁灭一切的氛围中，“解放”对绝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其直接意味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心理上的。投降，以及由此联想到的盟军胜利，以及美国占领军本身，将他们从死亡中解放了出来。成年累月，他们曾经一直做着最坏的打算。然后突然之间，紧张的压力不复存在。几



战败后，许多日本人都陷入了疲惫而绝望的“虚脱状态”。满载遣返的复员士兵与回乡平民的列车上，这位女性的表情，正强烈地显示出这种“虚脱状态”。此照片摄于1945年9月。

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重新获得了生命。对于天皇终战诏书的正常反应，是震惊到近乎麻木的状态，通常随之而来的还有彻底解脱的感觉。但是这种解脱感往往十分短暂。疲惫和绝望随即接踵而至：这是一种如此深广的心理崩溃状态，很快它就让人普遍联想到了“虚脱”，一个此前只用于临床医学领域的术语。据说，民众是被这种“虚脱状态”压倒了。

临近1946年年底，一本有趣的袖珍字典的日文校样，被呈送给了占领当局的审查官，以期获得正式出版的批准。这本名为《战后的新语解说》的字典，包含了有关虚脱概念的丰富词条。字典解释说，虚脱的本义是一个临床术语，用来描述个体病人精神或情感上疲惫不堪的状态。

只是在投降之后，它才被广泛用于刻画民众整体性的“心不在焉”和“精疲力竭”的状态。据这本小字典说，这种失去勇气的感觉，被普遍认为造成了国家最大的潜在威胁，成为“可能毁灭日本的大敌”。²

事实上，从投降前官员们的密报中，已经可以发现这种“虚脱状态”的集体表征。在战争远未结束之前，他们就敏锐地发觉了民众肉体的疲乏与士气的下降。1945年3月东京大空袭之后，当天皇罕见地出宫视察破坏情况时，并没有得到当地民众应有的敬意。天皇身边有危机感的军人，企图将此解释为士气低沉的征兆，或是虚脱。³无论是在战时还是战败之后，在一大批有识之士看来，这种集体的疲劳，的确是“最大的敌人”。正像它可以蚕食民众对天皇的敬意一样，它也可能阻碍战后的重建，更遑论在一片焦土之上建设整个民主主义的理想事业了。

饥饿与笋式生活

当然，广泛持续的疲惫和绝望，最终还是由于物质条件的贫乏。在当时的情况下，美方决定对日本的经济重建采取不插手的原则是自然而



90

到战争结束时，战场上的大批日本军队受到营养失调和疾病的侵害。这是美军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展现帝国军队在塞班岛投降时军中的饥饿状态。

然的事。对于曾带给别人如此深重灾难的战败的敌人而言，悲惨的处境被认为正是其应得的惩罚。无论如何，当美国自己的盟国还在为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而奋斗时，奢谈帮助日本重建实在是难以想象。而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发现自己正在一个饱受生产力停滞、物价飞涨之苦的社会中，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此后直到 1949 年，日本的政界、机关和公司社团的领导人举步维艰地等待着复苏、“经济民主化”和改革方案总体上步入正轨之时，绝大多数日本人正在为维持日常最基本的生存全力以赴。仅仅设法将食物摆上餐桌，就成了一项急迫的任务。饥饿与匮乏左右着度过的每一天。

饥饿不单纯是战败所造成的。其主要原因更在于漫长得令人绝望的天皇失败的战争，再加上严重的荒年歉收。投降后领导体制的混乱，官员的腐败和无能，更使情况加剧恶化。大多数日本人在投降时已经营养失调。甚至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粮食短缺。到 1944 年，偷盗田里的作物成风，使得警察称呼这类新型盗贼为“野菜泥棒”（偷菜贼），这种新的罪行叫做“野荒らし”（毁坏田地）。那一年，大阪县的官员估计，辖区内 46% 的经济犯罪与食物有关。一些创业者组织了非法的“采购部队”，专门将农产品贩卖到城里去。就在那年 8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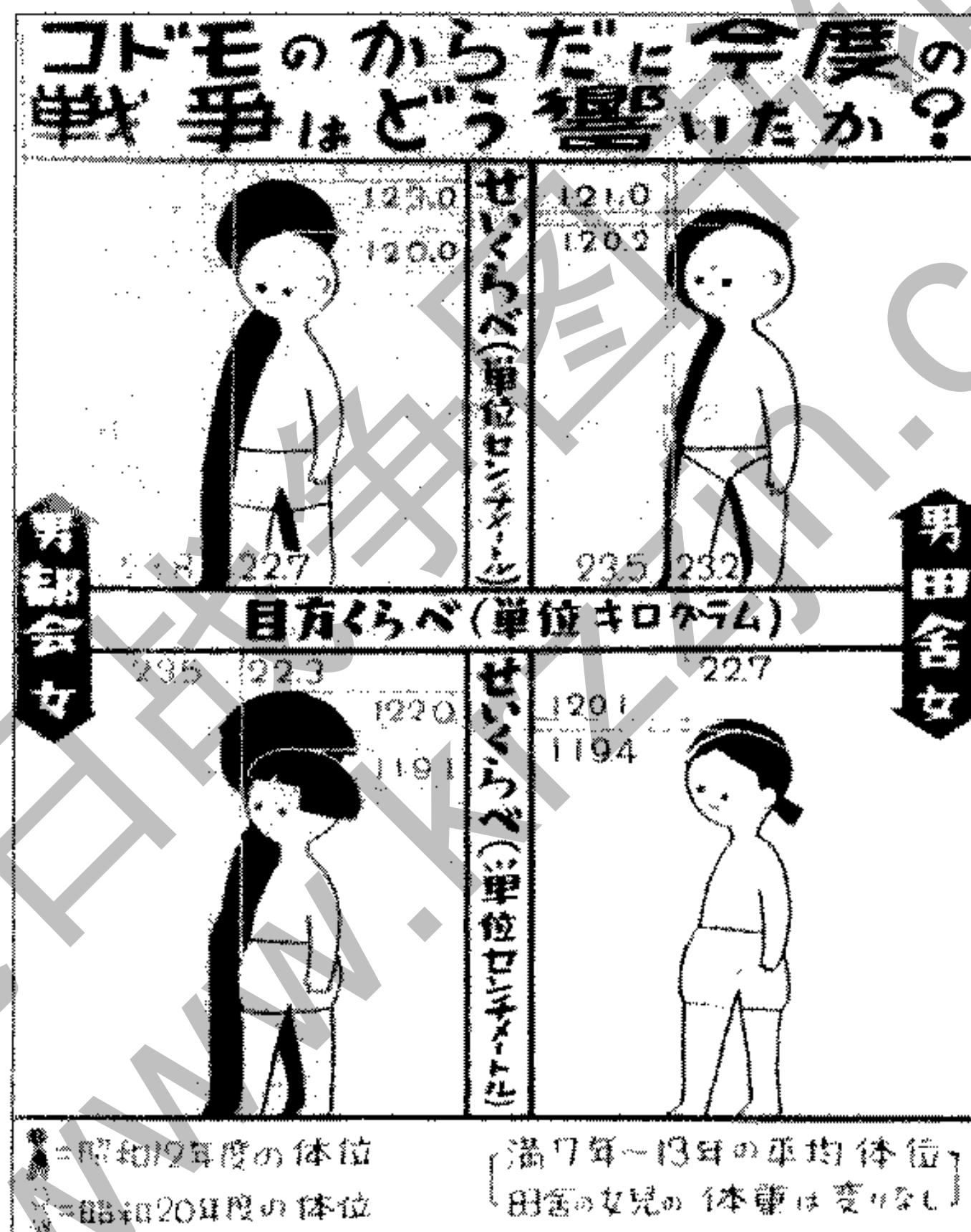
91 美军系统轰炸大城市之前，有这么一件典型的事例：在鹤见的三菱玻璃厂中，30% 的工人被发现因缺乏维生素患上了脚气病。到 1945 年，粮食短缺已经开始干扰战争成效并妨害到社会秩序。全国各地工厂的缺勤率普遍上升，大部分是因为工人们抽出时间到乡下买换食品。到 7 月，主要城市的缺勤率已上升至 40% 以上，粮食问题是导致此现象的主要原因。⁴

到 1945 年中期，盟军的“经济扼杀”政策已经将绝大部分日本海军和商业船队葬送海底，阻塞了日本通往后方和战争前线的运输线。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区，饥饿成了战斗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日本本土的粮食供应，严重依赖朝鲜、台湾岛和中国大陆。在偷袭珍珠港之前，从上述地区进口的粮食，占日本稻米消费的 31%，食糖的 92%，大豆的 58%，以及食盐的 45%。战败一下子切断了这些资源的供给。⁵

当战争接近尾声之时，日本任何地方的家庭都很少再以白米为日常主食。最普通的家庭食谱由大麦和薯类组成，甚至这些也陷入短缺。在

此情形下，大阪的当权者推荐了一份紧急时期的食谱，从中可见日常生存变得何等艰难。依据当地军官的一份研究报告，天皇的忠实臣民被鼓励吃橡子、谷糠、花生壳和锯末来补充淀粉摄入的不足。（据解释说，锯末可以被一种发酵菌分解成粉末，然后以 1:4 的比例与面粉混合，做成团子、薄饼或者面包。）至于矿物质的摄入，人们被鼓励以泡过的茶叶、玫瑰的种子、花和叶子来补足。蛋白质的不足，可以通过食用蚕蛹、蚯蚓、蚂蚱、家鼠、田鼠、蜗牛、蛇或是一种由牛、马和猪血干制

92



这张 1946 年的招贴图说明，战争是如何阻碍日本儿童的成长发育的。如图，前景中的图形是 1945 年 7 岁到 13 岁儿童的平均身高和体重，背景阴影部分则是 1937 年的数据。城市男童和女童（图左）的身高和体重，在 1937 年均高于同龄的农村儿童（图右），而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更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

的粉末来补充。研究者们报告说，如果好好消毒，老鼠尝起来就像是小鸟的味道，但重要的是避免吃它们的骨头，因为结果证明会使人体重减轻。就在天皇宣诏投降前不久，新闻媒体对这些饮食方法加以推荐介绍，其大字标题为《こうして食べば——工夫次第で材料は无尽藏だ》（《这样吃——只要发挥聪明才智，就有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⁶

这一时期，人均摄入的热量值，已远远低于从事轻体力劳动的人每日所必需的数量。1946年小学生的平均个头，比1937年的数据要矮。出生率急剧下降。婴儿死亡率上升。⁷甚至一位上了年纪的人道主义先驱、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战败前后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憧憬食物。1945年7月到9月间，这位老共产主义者为自己写了一组短歌，抒发他对馒头（一种先前很常见的豆馅点心）的渴望。⁸一个小女生听到天皇广播的第一反应，就是她再也不用跟青蛙大眼瞪小眼了。这指的是打发孩子们出去捉青蛙来吃的实习。看来她所期待的解脱，实在有些早熟。⁹

战败不仅是切断了日本从亚洲获取粮食资源的途径。战败当年的仲夏时节，上一年收获的大米也逐渐消耗殆尽。由于帝国内外交困，还有上百万憔悴不堪的平民和复员军人将被遣返回国，获得一次粮食大丰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气候失调、人手不足、工具短缺和化肥减产，1945年成了继1910年以来最大的荒年，粮食产量比正常年景减少了接近40%。看来众神真的抛弃了这片“神国”的土地。¹⁰

官僚和农民也放弃了对国民的责任。大部分农产品立即就转移到了黑市。谣言四起，据说上百万人会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被饿死。10月初，农林大臣了解到东京仅剩“三天”的大米储备（还掺上了大豆和豆渣）而十分震惊。这是依据每个成人在不甚活动的情况下勉强存活的需求定量做出的估计。他的同僚大藏大臣告知美国合众通讯社说，如果粮食进口不立即到位的话，可能将有上千万人饿死。这一庞大的、而且被过分夸大的数据被深信不疑地接受了。

10月28日，媒体公布了一起具有警戒意义的死亡案例，似乎预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一位著名院校东京高等学校的德语教授龟尾英四郎，死于营养不良。11月1日，一个新成立的市民团体“饿死对策国民协会”宣布，东京上野车站的无家可归者，每天有多达6人死于营养不良或者相关原因。营养不良，或者说营养失调，成了那个时期醒目的词

汇。11月中旬，据报道，位列东京之后的5个日本最大的城市神户、京都、大阪、名古屋以及横滨，共饿死了733人。在首都情形是如此混乱，以至于根本没有一个总的统计数据。粗略估计，战败后3个月内，东京死于营养不良的人数超过1000人。¹¹

从美国运来的食品，帮助避免了预期的灾难，而在此过程中，也提升了美国慷慨好施的形象。当时的一本年鉴描绘美国的食品运输就如“旱天の慈雨”一般。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它们则“在沮丧的府民心里⁹⁴燃起了希望之火”。食品援助主要是主食，如小麦、面粉、玉米，豆类、食糖和少量的大米、奶粉，以及罐头食品，如咸牛肉之类。食品运输在几个援助项目的赞助支持下，一直持续到占领期结束。¹²然而，饥饿仍在延续。尽管大米是名义上的主食，但是许多家庭只是将这种珍贵的主食做成稀薄的米粥。1946年中期，一项针对小学生家庭的调查发现，至少每天一顿米粥替代了米饭。对于1/4的家庭来说，米粥是每餐的主食。菜叶汤是日常的另一种主要食品，还有自制的面包和团子搭配蒸番薯。典型的灾荒食谱还包括橡树子、橘子皮、竹芋根、米糠团子，以及平常年月喂牲口的麦麸饼。¹³

垄断大众出版物市场的最大的保守出版社讲谈社，总体来说对如何由军国主义宣传向新的时代话题转换相当困惑。然而，战后它最早出版的杂志，却迅速及时地对准了食品危机。它以主妇为导向的杂志《妇人俱乐部》，投降后第一期用大量篇幅谈论种植家庭菜园和如何在匮乏时期做出有营养的饭菜。8、9月号的《少女俱乐部》里有这样一些文章：《怎样吃橡树子》和《让我们捉蚂蚱吧》。对于年轻的少男少女们来说，蚂蚱和橡子并非能够引起他们兴味的研究对象，却是潜在的蛋白质来源。¹⁴

虽然占领当局和政府做了努力，但持续数年间，哪怕是最基本的粮食收购和发放都是一片混乱。1946年2月，为控制大米和其他主食流入黑市，政府采取了由警方执行的“强制供应”措施。由于这些行动常有美方的军警支援、由军警的车辆递送，因而老百姓将此称为“吉普供应”。尽管政府的新配给系统付给农民双倍价钱，但是黑市仍然对生产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举例来说，6月份黑市大米价格比官方的配给价格高出30倍。两年后，黑市价格仍然约相当于官方牌价的7倍半。¹⁵



战争结束时，粮食危机是如此尖锐，甚至连东京闹市区被炸毁的地方也被开垦成了菜地。这张照片摄于 1945 年 10 月，东京的中央区新桥站附近。

城里人成群结队地到乡下寻找食物。很多农民都乐于跟这些从前高高在上的城里人做实物交易。和服、手表、珠宝和其他值钱的物品，都被拿来换吃的了，从而诞生了当时一个最著名的说法——“笋式生活”。可吃的竹笋可以层层剥开，“笋式生活”的现象，则指的是城市人层层脱下他们的衣物和其他财物换吃的。相似的说法还有“洋葱式生活”，就像剥洋葱时眼睛会因辛辣而流泪一样，一个人层层剥除先前的所有财物也会心疼掉泪。

对于动荡混乱的 1945 年和 1946 年来说，各方面的官方数据基本上不可信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然而，有关政府粮食配给的片断记录，却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在理论上应当保障所有家庭生存的不可预知的系统。1946 年，东京居民一年中有 6 个月得不到足额的粮食配给。1947 年，尽管粮食收成不错，配给却更糟糕了。在两年间，全国各地配送通常都推迟一到两周。从春末到秋初，大米的配额急剧下降，而代之以各种谷物

的粉末。¹⁶

如果粮食没有成为一天的主要话题，这一天似乎就不算过完。很快市民团体纷纷出现，抗议政府糟糕的配给制度。在这种方式下，饥饿和匮乏成了民间激进政治运动的刺激物。1946年5月，战后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之一，一档独创性的观众访谈节目“街头录音”，是以这样的方式开播的：在东京的银座大道上，记者向来往的行人询问这个新时代最熟悉的话题：“你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的？”据报道，因为无法向学生们提供午餐，许多地方学校只得关闭数星期或者只开设上午的半日制课程。直到1947年7月，还有一位神户的老师写信给报纸说，一位中学生要求降级到小学去，以便能够分享那里免费的午餐。公务人员因找粮食果腹而造成的缺勤率上升到15%以上，甚至连东京警视厅也为员工提供每月的“食粮休假”。¹⁷

与粮食相关的活动和话题深深地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1946年9月，“吃面包比赛”开始在小学运动会上大为流行。在这种广受欢迎的竞赛中，选手们必须尽力跑向用绳子吊起的面包卷，然后不能动手就将它吃下去。不用说，在这样的比赛中，根本就不会有失败者。大约与此同时，在横滨人们已经习惯自己带饭团参加婚礼，而不是由新婚夫妇摆设婚宴。饭馆的剩菜，甚至高级餐厅的垃圾，都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来源。常有受人尊敬的长者因为偷了几个薯芋而被捕的悲惨新闻见诸报端。一家鼠患成灾的旅馆的老板，不得不放弃放置有毒食饵的灭鼠方法，因为人们会捡起饵料吃下去。¹⁸

按照官方自己的标准，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摄取大约2200大卡的热量，才能够维持轻体力活动。而1945年12月，政府的配给量只有此定量的一半多一点。1946年中期到1947年中期，当配给制度难以支撑的时候，配给量有时下降到仅有定量的1/3到1/4强。¹⁹事实上在此境况之下，人人都违背法律而求助于黑市。直到1948年还流传着这样的严酷笑话，正如一本杂志的社论中所说，“在今天的日本，只有那些在监狱里的人才过着不违法的生活”。²⁰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依赖黑市商品生存是种令人畏惧的前景。这不仅是因为黑市物价要高出法定物价许多倍，而且这一切是发生在通货膨胀节节攀升的情况之下。在这一点上，这些已经丧失安全感的家庭，更是感到被卷入了动荡的漩涡之中。

忍所不能忍

1945年11月7日，《朝日新闻》的大版版，发表了下面这封题为《我正打算自杀》的信：

我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处于生死关头。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有的只是对我们无能政府的怨恨。我有五个孩子，我努力工作，甚至在这样的艰难时世中还设法攒点积蓄。可是政府对于粮食供应的无能，使得情形越来越差，我每月至少有一半时间不能去工作。我为孩子们感到难过，可是，想到我们的孩子们将来可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我只能从黑市上买吃的养活他们。但那支持不了多久，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最终，我甚至借了高利贷来买粮食。但是我无法再这么做了，所以我们已经整整四天没吃饭了。我妻子昨天完全垮了，有两个孩子开始神志不清。政府只会说，什么也不会做。我明白那些达官贵人只顾自己酒足饭饱，但是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另一方面，那些做黑市买卖的邪恶商人，我们周围就有两三个，每年能挣五六万日元。

最后，我决定自杀。我要以死来谴责无能又无情的政府。我已经拐弯抹角地恳求邻居和邻组的组长帮助照看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了。请给我们足够的食物，以便让我们能够工作，就是稀粥也行。像我们这样没受过教育的人，不懂得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我觉得肯定有足够的大米和麦子。看，只要你有钱，一石、两石的大米和麦子马上就能到手。并不是没有粮食。官老爷们，收起你们几年来让别人遭受折磨的麻木不仁，拿出点人心来吧！现在，我第一次感到，日本确实应该是一个四流国家。没有真正的好政策，它还会沦落为五流甚至六流国家。当这封信送到你们手上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我是用剩下的全部气力写这封信的。

此信署名为“一个劳动者”。编辑在简短的附言中，敦促写信的人放弃自杀的念头，并立即到当地的警察局为自己和家人寻求救助。

读者的反响在一周之内就刊登了出来。一位读者评论说，到警察局

去，结果只能使写信的人被当作罪犯对待。另一位读者赞同说，冷漠的官僚们不会有什么新花样。无论战时还是战后，当官的都一样。物价确实高得离谱，但是如果 11 月 7 日写信的那位老兄还活着的话，他建议他勇敢地活下去。第三位读者写道，他读了那封自杀的信后，整天哭泣。他引用天皇终战诏书中的话，鼓励写信者要“忍所不能忍”。他说，如果还不算太晚的话，请写信者或是他的家人寄来姓名住址，他想分给他们一些薯芋。²¹

事实上，假使写信的人真的决心忍所不能忍，那么他将至少还要面对 4 年的艰辛与动乱。对于数百万的蓝领和白领家庭来说，直到 1949 年之后，生活或者说仅仅是每日的生存，才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统计数据能够量化这些年来悲惨的经济状况，但是对于个人而言，所付出的



99

这是一幅贫穷男女在街边叫卖杂物的典型场景。从照片上这位男子的帽子、上衣和绑腿可以看出，他是个复员军人，身上穿的是他仅有的一套衣裳。

代价就不仅仅是所谓身心“虚脱”的状态，还包括从疲惫沮丧中解脱出来恢复身心的时间。

在“一个劳动者”给报纸写自杀信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东京以北埼玉县的一位家庭主妇，向全国性的报纸投书，感叹一成不变的悲惨生活之艰辛。她生动地描绘出了这样的生活场景：背着孩子，冲锋陷阵地领取配给的大米和物品；不管走到哪儿，都得捡拾碎柴禾补充家里的燃料不足；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操劳一整天，却看不起一场电影甚至买不起一杯咖啡；吃饭时将难得一见的牛肉片或别的好吃的留给家里其他人；不化妆就出门，仍然穿着磨坏了的松松垮垮的雪袴；在每日艰辛的生存折磨中告别青春、丧失才智、失掉了一切。她解释说，这不仅是她个人的自画像，而且是她周围绝大多数妇女的可悲命运。²²

1947年11月初，一桩事件使举国震惊，将政府关于粮食危机的无能聚焦在耻辱柱上。拖延20天后，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位33岁的法官山口良忠饿死的事实。山口原先是东京地方法院负责轻微经济犯罪法庭的审判官。他审理的案件绝大多数与黑市交易有关。真正牟取暴利的奸商几乎从未被带上他的法庭。事实上，他被要求审判的所有犯罪嫌疑人，不过是些绝望的男人和女人，正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100 山口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一位法官的女儿，后来回忆起丈夫曾经讲过的一个案例：一位72岁的老太太，她的儿子没能从战场上回来，媳妇也在一次空袭中丧生了。当被捕的时候，老太太正设法变卖自己的财物比如和服什么的，从黑市上买粮食养活两个孙子。因为是再次犯法，法官别无选择，只好将她送进了监狱。

山口法官的小小法庭，正是上演荒诞人生的国民大舞台的一角。当企业家、政客和前军官们正在黑市上大发国难财、政府官员大吃大喝招待他们的美国主子的时候，1946年大约有122万普通男女因黑市非法交易罪被捕，接下来的两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了136万和150万。从年轻法官的立场看来，他别无选择，只能给他们定罪。然而，就连他自己的家庭也得依靠黑市获取基本的日常用品。在他去世之前半年，一份大众杂志发表的短文推断，如果所有限制黑市的规章制度都严密实行的话，全国每个人都得进监狱。²³

年轻法官解决这一道德难题的办法，不是向法律挑战，而是躬身实

践它。正像他告诉妻子的那样，以清白的良心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分担人民的苦难。1946年的某日起，他要求妻子不要再给他吃自己配给额以外的食物，尽管妻子可以心照不宣地从黑市上买食物给孩子们和她自己吃。从那以后，家里从合法渠道获得的绝大部分粮食，尤其是大米，都给了孩子们。山口的遗孀后来回忆，有些日子她和丈夫只是靠喝盐水度日。山口法官死于1947年10月11日。²⁴

当时对这一事件议论纷纭。山口法官的死亡激起了人们的震惊和赞美，也招致了零星的批评的声音。例如，将山口法官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成为流行趋势之时，有一位公民提出了异议。他反问说，难道为好的法律奋斗到死，不比坚守有害的法律而亡更明智吗？在稍后的一场庭外讨论中，最高法院院长官三渊忠彦指出，尽管山口法官被要求执行的法律效率低下，但其最终目的是有益的，确实是为了抑止黑市行为，使基本生活用品供应更加充足。同时，他也承认，活下去比不违反粮食法规更重要。²⁵

无论如何，山口法官富有警示意味的死亡，几乎没有改变任何情况。粮食短缺仍在持续。黑市继续繁荣。失业者处境艰难。物价飞涨到



101

1947年12月24日，日本投降两年零四个月之后，日本警方在东京上野站的地下通道，进行了一次夜间搜捕活动，围捕了居住在这里的744名男子、200名妇女和80名儿童。

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1948年，妇女们仍然靠捡破烂拾木柴取火，为买一点薯芋要等待数小时。正如有人在那年二月所写的那样，主妇们依然抱怨在排成长龙的队伍中，“蓬头垢面，穿着磨损的雪袴和肮脏破败的罩衫……就像脏兮兮的牲口一样”。无家可归者仍然因饥饿致死。甚至到了1949年的2月，新闻仍然报道说，与前三年每年冬天死亡上百人形成鲜明对比，那年冬天上野车站“仅有”9个无家可归者死亡。²⁶

1950年初，大阪的一位中产阶级主妇冈野秋子，为一本妇女杂志撰文，清晰描述了像她这样的家庭是怎样度过“忍所不能忍”的日子的。她的丈夫，一位军事相关院校的教师，在投降后失业了。但是他很快找到了一份低级职员的工作，月收入300日元。当时，一升米就要80日元，因而他们开始靠变卖财物勉强度日。
102

1946年初，当引入“新日元”遏制通货膨胀的企图失利，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雇佣秋子丈夫的公司歇业了，仅留给他900日元作为遣散费。由于没有得体的鞋袜，秋子与两个三岁和五岁的儿子从不敢离家太远。秋子怀着孕，不可能到外面工作。1946年初大米的配给价格上涨了3倍，但是由于原则和贫穷，冈野家尽量不到黑市上买东西。

最后，她的丈夫找到了一份在学校当老师的新工作，月薪360日元。他们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能继续变卖家当。每月买黑市物品8次，花费大约400日元。秋子采拾欧芹、胡蒜和羊齿苋补充大米和谷物的不足。肉类和鱼根本就买不起，而两个孩子开始出现营养失调的征兆。食物成了挥之不去的困扰。秋子关于这一点的记录极为生动。尤其是小儿子，他的腹部开始鼓了起来，看上去像青蛙。多少次孩子们饿得哭叫起来；多少次一家四口早餐时只分吃数十颗炒豆和茶；多少次她的丈夫没有吃午饭。这个家庭吃一切看起来可吃的东西：南瓜的叶子和茎秆、番薯的藤蔓、路边的植物。他们试着养鸡，但是小鸡也由于营养不良几乎站立不稳，而且一年半之后才能下蛋。有那么二十天的光景，他们甚至买不起薯芋，只能靠南瓜度日。当时学校遇到财政困难，她的丈夫再次失业了。这次他只拿到50日元的解聘费。而且他也开始出现明显的营养失调症状，整个身子都肿胀起来。孩子们没有力气再哭喊，只能静静地躺着。只有新生的婴儿打破静寂，发出虚弱的啼声。

接下来的两年，情况略有起色。1947年，秋子找到了一份在家纺线

的工作，有时凌晨三点就起来工作。这种在家的计件工作，如缝纫、卷香烟（往往是用丢弃的烟屁股）等等，是很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1948年，粮食供应状况稍有改善，尽管薯芋仍然是家里的主食。那年丈夫和妻子都病得厉害，欠了许多外债。1949年，又一个孩子降生了，鱼 103 和肉类终于又丰富起来，尽管房租和粮食价格继续攀升。维持收支平衡还很困难。1950年初，她的丈夫在一所大学里谋到了教职。这是战争结束后，全家人第一次可以依靠他的收入过活了。秋子写道，这样，她终于能够考虑一下家庭生活的质量，不再仅仅是活着而已。²⁷

日本的绝大多数中下层家庭都有类似的故事，其中有一些，至少在讲述时，会带给他们一种拉伯雷式粗俗幽默的快活。例如，要控制肠子和膀胱，常常需要战术安排。坐数小时拥挤的火车来往乡间去换东西的人，在途中通常得节制饮食，因为根本没法上厕所。一大家子挤住在一处没有上下水的房子里，不得不设法到别处解手。居住拥挤也意味着要暗地里争夺稀缺的资源。一位年轻的丈夫和他怀孕的妻子后来生动地回忆起将一块巧克力藏在浴室里，那是他们唯一能够分享它而不被嫉妒的亲属们看到的地方。²⁸一篇在《读卖新闻》上连载的流行小说，推出了一个流行语——“土曜夫人”（礼拜六太太），形象地捕捉到了已婚夫妇们的挫折，他们不得不在星期六的夜晚，逃到小旅店这样的地方，只不过为了独处一会儿。²⁹

更为可怕的是，看来一场瘟疫已经向这个国度袭来。在战争时期曾广为流布的传染病，现在又在战败带来的污秽、混乱和贫穷中滋生蔓延。1945年因赤痢死亡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两万人。1945年到1948年间，据报告超过65万人染上了霍乱、赤痢、伤寒、副伤寒、天花、斑疹热、猩红热、白喉、流行性脑膜炎、脊髓灰质炎或脑炎。据官方报告说，其中有99654人死亡。³⁰

肺结核夺去的生命比其他所有疾病加起来还要多。自193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的肺结核死亡率一直稳步攀升。1935年，这种疾病致死130763人，1942年则为160398人。凭借有力证据可以推定，接下来的四年间死亡人数更加庞大。1947年，官方统计恢复，据报告有146241人死于肺结核，而且直到1951年，每年肺结核的死亡人数才降到10万人以下。³¹每有一人死于肺结核，就有其他数人被传染。投降之后，每年

104 感染肺结核的总人数可能有上百万人。³² 就像受原爆辐射伤害者、肢体残废者、战争孤儿和战争寡妇，或者“第三国人”一样，肺结核病人也是一种社会耻辱的印记。所不同的是，在这种情形下，疾病的传染性是他人恐惧躲避的理由，但是社会效果都差不多。通常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都遭到所在社区的疏远和隔离。³³

绝望的社会学

在天皇终战诏书广播之后的第二天早晨，神奈川县的农民做出了过去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举动：他们起床晚了。³⁴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常年的肉体和感情消耗向他们袭来？或者这种集体行为只不过是对战败打击的本能反应？这是不是应当看作无力的“虚脱状态”的体现？确切地说，农民们的疲乏是因为所有的这一切。

承认战败令人痛苦，而且这种痛苦马上在绝望的言辞中体现出来。人们谈论“可耻和不名誉的”无条件投降。对许多人来说，突然面对迄今难以出口的“失败的战争”，让人发怔。自 1930 年代初以来，日本人就被教导说，他们参战是为了最神圣最高尚的目标，为他们的“伟大祖国”和“伟大民族”而战。他们是一个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屈不挠的“大和魂”的民族，作为“指导民族”注定要打倒西方帝国主义，并且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而现在，如何向战死者交待？在崇高的目的意识完全丧失的人世间，人们如何在身心两方面生存下去？任何被动员进行圣战的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牺牲之后，被告知他们已经被完全打败、现在必须看胜利者的脸色行事，可能都会有类似的反应。就战败后的精神麻木状态而言，无论“虚脱”这个词如何难懂，它所描述的日本人沮丧消沉和茫然迷惑的状况并没有什么稀奇。

如果将“虚脱状态”单纯归罪于战败的打击，将会使人误入歧途。其实，一种深刻复杂的疲惫，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之前早就开始了。它是政府滥用民力追逐不可能实现的战争目标的结果。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警察的秘密文件和权威人士的日记中，都充满了对于战争疲倦和士气消沉的担忧。³⁵ 同样地，延续数年的疲惫和失望，与其说是反映了持久的战败创伤，不如说是由于投降后领导层的不称职和彻底腐败，导致战

时的疲弊进一步恶化。以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来，日本从战败中恢复过来十分迅速。然而，对于平民百姓，战后的复苏看起来令人苦恼地漫长。

民众在意识到特权阶层在战败后继续像他们在战时那样兴旺发达时备感挫折。投降一年零四个月后，一位劳动者愤怒而怨恨地描述了他所在社区两所高级餐厅周边的活动。一座摆满“山珍海味”的西式饭店，官僚、银行家、公司经理和警察向来是座上的常客。附近的另一家日式餐厅，夜夜挤满了坐轿车来的客人。而且一旦喝起酒来，他们还会高唱刚刚结束不久的那场战争中的爱国歌曲。这位工人说，这跟人民设想将要开创的“民主”社会相差太远了。³⁶

106



在投降后的混乱之中，一项更具冲击力的改革“集体相亲大会”兴盛起来。这是1948年在镰仓的鹤冈八幡宫举办的相亲会上，寻找配偶的青年男女合影时的紧张姿态。他们每人都佩戴一个号码，与他们按照背景、爱好等所填写的表格相应。

媒体不停地曝光标志社会崩溃的所有事件，定期报道警方对无家可归人员的围捕行动。1947年初，新闻界碰巧发现，现在已经因战争罪接受审判的前将军和首相东条英机的弟弟，就住在大阪难波区的流民中间。临近那年年底，据报道皇太子的爱犬失踪了，恐怕已经像许多其他不幸的非皇家犬类一样，被剁成肉馅摆上了某人的餐桌。身上挂着广告牌的人，成了战后迷茫的象征。尤其是在1948年，媒体发现一个在街上蹒跚而行的、身上前后都挂着广告牌的被遗弃的家伙，就是另一位昨日的权势人物——前海军大将高桥三吉元的儿子。还是同一年，在普通民众中迟迟徘徊的疲惫，转换成了针对占领军当局一项小小的改革措施（引入美式夏时制）的大规模批判。当时这种叫做“夏令时”的令人惊奇的新概念，其做法就是将时钟向前拨快一小时，纯粹是因为延长了“白天”的艰辛生活而遭到反对。人们宁愿黑暗来得早些，尽管直到1951年的9月，他们才取得废除夏时制的成功。³⁷

克服虚脱状态的绝望斗争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是“集团见合”（集体相亲）。这是一种青年男女为寻找结婚对象的明确目的而集合在一起的活动。传统的“见合”（相亲），是在两位相亲对象和双方家长之间安排见面会。在这种相亲活动中，通常双方当事人，尤其是女方很少有最后的决定权。在时代的混乱当中，由于家庭、社区的分崩离析和媒人的短缺，这种个体的相亲安排已经难于实行。正值婚龄的年轻姑娘们发现自己陷入绝境，因为刚刚结束的战争，导致了107一大批潜在丈夫的死亡。1940年，介于20岁到29岁之间的人口本来是男多女少，7年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人口已经超出男性100万人。一大批出生于1916年到1926年间的女性，面临的不仅仅是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独力应付战后的艰难，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机会。

这就是空前的“集体相亲”奇观的社会背景。第一次集体相亲，是在1947年11月6日由一份婚庆杂志《希望》赞助承办的，在东京多摩川畔的丸子桥附近露天举行，吸引了386位男士和女士。第二年春天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第二次集体相亲，吸引了4000名以上的参加者，并且同时收到了来自现任首相芦田均和前任首相吉田茂的贺信。同年末，一本著名的女性杂志，发表了批评家今日出海的文章，记叙在镰仓雄伟庄严的八幡宫举办的小型集体相亲会。他描述当时的气氛混合了绝望和相当

的公事公办的程序意味，尤其注意到妇女们是如何仔细地查看男人们的简历，以及她们挑选看来最有吸引力的人选时主动的进攻。今日出海对年轻妇女们在非常的环境中为创造正常生活而奋斗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活力印象深刻，同时也被似乎攫住了所有参与者的痛苦的急迫感所打动。³⁸

新闻界唤起对酗酒、吸毒、暴力以及非暴力犯罪增长的注目，这些是虚脱状态更为严峻的标志。酗酒，在男性社会中从来就不是什么稀罕事，现在成了标志社会瓦解的丑恶现象，部分是因为由可疑和危险的成分勾兑的廉价酒到处可寻。カストリ烧酎（粕取烧酒），一种极其普遍的用米酒酒糟生产的劣质酒，据说能使绝大多数饮酒者三杯酒下肚，就人事不省。一种叫做“粕取文化”的完整的亚文化群落，在这个醉酒世界的周围发展起来。廉价酒的破坏作用有时迅速而猛烈，尤其是另一种受喜爱的便宜酒“爆弹”（炸弹），它是由甲醇以及各种其他液体调制的混合酒。1946年11月，政府报告说自投降以来，已知有384人死于甲醇中毒，而且有理由推断，大量的人因这种残酷的醉人之物而永久失明。“爆弹”的威力尽人皆知，它成了黑色幽默的主题。例如，插图杂志《朝日グラフ》登过一幅漫画：一位瞎眼残疾的老兵戴着墨镜，站在路边的饮食摊前说，“就算是甲醇，也没关系”。³⁹

黑市是甲醇和邪恶的粕取烧酒的主要来源。黑市还成了违禁药品的主要来源，包括海洛因和非洛朋（philopon），非洛朋即甲基安非他明，本来是战争中飞行员用来保持不眠的刺激药物。尽管药物滥用并没有在普通民众中广泛出现，但是它在作家、艺术家、俳优中盛行，他们是构成“虚脱文化”世界的更为引人瞩目的华丽群体。⁴⁰

由于与作家和艺术家的波希米亚式的奔放生活相联系，药物滥用成了时尚颓废的某种标志。社会崩坏更令人担忧的标记，是看起来到处蔓延的贪婪和犯罪。在前所未有的混乱中，所有关于日本独特的人种和文化的“和”、“美俗”以及社会的“家族”团结的说教，都被证明空洞无物。大规模的腐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黑市上的欺诈行为早在意料之中。突然，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掠夺犯罪的牺牲品。尽管日本军人曾在海外骇人听闻、肆无忌惮地烧杀奸淫掳掠，战争期间日本本土的犯罪率却有所下降。而战后，至少通过新闻记录就可以判断——这的确也是人民实际判断的依据——无法无天的行为迅猛蔓延。特定事件因其象征意

味而被大书特书。例如，据报道说，闻名西方的“神风特攻队”，就是在战争最终阶段执行自杀式飞行任务的日本“特种部队”，其剩余成员转而进行暴力抢劫。“特攻队くずれ”（堕落特攻队）的说法流行一时，指的就是这种全套的喝酒、玩女人与犯罪的堕落行为。这个世界已经黑白颠倒了。⁴¹

报刊也刊登抢劫受害人催人泪下的请求。一位怀孕的妇女恳求一个不知名的小偷归还盗去的婴儿衣物，因为她无力再重新置办它们了。与此相似，一个孩子要求窃贼归还他家被盗的衣物。据报道说，有些团伙专门抢劫遣返归来的疲惫的平民和复员军人，专伺他们离船登岸时下手。⁴² 手持武器的强盗在街上或者居民家中胁迫他人，成了漫画家与喜剧演员黑色幽默的好题材。1947 年的一档喜剧广播节目影射，现在持枪、
109 持刀、入室盗窃、武装抢劫和杀人的人如此众多，真该像其他工种那样组织工会了。⁴³

这种新的犯罪景象，并不是单纯由道德败坏和失业的男人造成的。有些学生也因为抢劫被捕。1946 年 7 月，警方宣布破获一起 50 余人的女性犯罪团伙。她们正式分为“卖春组”和“敲诈勒索组”。后者专门抢劫和胁迫其他的妓女。这个团伙的名字漂亮而富于国粹色彩，她们自称“血樱组”。⁴⁴

耸人听闻的谋杀案，加剧了日益增长的社会解体的感觉。1946 年 3 月 16 日清晨，65 岁的歌舞伎俳优片冈仁左卫门在家中被残忍地用斧头砍死，同时遇害的还有他年轻的妻子、襁褓中的儿子以及两名女仆，其中一位女仆只有 12 岁。原来，杀人者是住在片冈另一栋房屋中的 22 岁的作家，正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侦探后来估计他每日的饮食热量平均只有 920 大卡。显而易见，当他激烈抱怨片冈的优雅舒适的生活方式时，与片冈发生了口角。随即片冈责令他离开住处，作家狂怒之下杀了他们全家。⁴⁵

这件轰动性的杀人事件震惊全国。一个月后忧虑恐惧的气氛更浓。一位 24 岁的年轻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父亲拒绝跟他分享从黑市买来的食物。4 个月后，警察逮捕了一位曾经被授予勋章的复员军人，他八成曾在中国犯下过暴行。其罪名是诱拐杀害两名年轻女性。警方很快发现他们手上的罪犯是一位连环杀人犯，至少谋杀了

10位妇女。甚至在这样病态的犯罪行为中，也能发现与饥饿相关的线索。罪犯每次都是用提供食物的方式来诱骗他的受害者。⁴⁶

警方有关投降后的犯罪记录则更为平实。以美国的标准衡量，被逮捕的人数还算正常。另一方面，犯罪率与1937年到1945年间的数据相比显著升高，这是因为战争时期进行海外侵略的同时，国内却加强了专制控制。与1930年代中期相比，杀人案的比率可能没多大变化，而且如欺诈和贪污等所谓智力犯罪，实际还有所下降。意料之中的是，武装抢劫、偷盗、买卖赃物明显比战前增加了许多。如1934年，2126人因抢劫罪、724986人因盗窃罪被捕入狱，而1946年到1949年间，平均每年相应的数据分别是9485人和1177184人。年轻罪犯的数量也出现戏剧性的上涨。1949年4月，据报道，全日本一半的重罪（比如谋杀、强奸妇女、武装抢劫、恐吓、纵火等），是由8岁至25岁年龄段的罪犯犯下的，犯罪率高得令人担忧，每两分钟就有一起。⁴⁷

孩子们的游戏

孩子们的游戏，可以作为反映时代生活的晴雨表。在各种消费主义观念仍远未到来的时代，孩子们主要依赖自身的想象力生活，他们的游戏成了衡量成人世界的生动有趣的尺度。不久之前，特别是男孩子们，还以令人心寒的天真无邪玩着战争游戏，就像他们被教导鼓励的那样。在游戏中，他们头扎束带，想象自己正驾驶飞机执行任务，事实上，在战争中这些飞机再也没能返航。他们假扮英勇的帝国海军，实际上，帝国海军早已被摧毁击溃。他们手持木制的刺刀长矛，尖叫着向代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假人冲杀，假装自己正在从外国鬼子的手中拯救祖国。⁴⁸战败后，孩子们的游戏不再含有如此明显的教化意味。本质上，他们只是在模仿他们看到的成人行为。这是一幅发人深省的图景。

当时孩子们没有多少玩具可买，尽管战后流行的第一种玩具富于启示意味。1945年12月，京都的一位玩具制造商生产了一种不到10厘米长的吉普车，售价10日元。货架上的10万件产品很快卖光，宣告了玩具工业谨慎的复苏。这种玩具典型的美国风格正合时宜，因为孩子们是以肯定的、不加批判的方式来对待既成事实的，他们欣然接受被占领的事实。吉普车与兴高采烈的美国大兵们分发的巧克力和口香糖密不可

分，而这是被战争破坏的生活中可能联想到的少有的美好事物。“哈罗”，“再见”，“吉普”以及“给我巧克力”是绝大多数孩子最早学会的几句英语。他们还学会了将报纸折成美国大兵柔软的船形帽，而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武士头盔。对于上了年纪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人来说，儿童游戏中的大部分，看起来都是以被占领状态为乐。

这些游戏的确是快乐的，毕竟快乐是游戏的意义所在。但是，成年人看到这些快乐的游戏，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悲哀，因为它们如此天真无邪地清晰凸现了战争与战败带给人们生活的痛苦。譬如 1946 年初，据说小孩子中间三个最流行的游戏，分别是“黑市游戏”、“潘潘（panpan）游戏”和“民主游戏”，即模仿黑市交易，假扮妓女拉客，以及模仿左翼示威活动。

111



潘潘（panpan）游戏，假扮美国大兵和妓女，成了男孩和女孩中间最流行的游戏。其他创造性的儿童游戏，包括模仿黑市交易、劳动者示威和超载的火车。

黑市游戏——黑市商贩与黑市物资的登场，回想起来，可以看作是一种培养小企业家的教育，但是对当时的大人们而言，只能提醒他们被迫参与非法交易填饱肚子的残酷事实。“潘潘游戏”这种模仿妓女拉客的游戏，更使家长们难以接受，因为“潘潘”是战后对于那些专做美国大兵生意的站街妓女的一种委婉称呼。一张 1946 年初的照片上，衣衫褴褛的欢笑的儿童们正在玩这个游戏——一个头戴美国兵船形帽的男孩，胳膊上挎着个穿补丁裤子的小女孩。在“示威”游戏中，孩子们挥舞着纸做的小红旗跑来跑去。当孩子们长大一些，游戏渐渐变成了实践。新闻界留意到，遭取缔的妓女中包括年仅 14 岁的年轻女孩，而学校里的男生们与孤儿和流浪儿一样，很快就学会了当皮条客挣零花钱。他们把美国大兵领到女人那里。对一些人来说，“你想见见我姐姐吗？”成了继“给我巧克力！”之后学会的更高程度的英语词句。

随着时间的流逝，游戏项目也有所扩充。1947 年中期，一位大阪的老师报告说，他的小学生们都迷上了挤“火车”的游戏。他们将教室前面的讲台作为他们的活动中心。在“遣返列车”上，孩子们背上他们的书包，挤在讲台上摇来晃去，然后在“大阪”站下车。而“特别列车”，顾名思义是模仿占领军人员的“专列”，只允许“漂亮人儿”上车。由一位“列车长”判断谁够幸运上车。衣服上掉了一粒扣子？不合格。脸上脏乎乎的？不合格。那些通过了这些刁难的孩子，悠闲自在地坐在车上。而那些被拒绝的孩子则羡慕地站在旁边看。而“普通列车”，每个人都往上挤，推来搡去，抱怨着被踩了脚，大声地呼救。偶尔，列车长勉强挤在讲台边上宣布列车已经挤塌了，每个人都必须下车。这位老师悲叹，那真是一幅令人难过的景象：从模仿战争到模拟彻底的混乱。

进入 1949 年后，孩子们继续以游戏反映出社会秩序的混乱。在“流浪者”游戏中，他们假装无家可归的流民。这个游戏得名于德语词“lumpen”（流氓无产者），起初它是以“lumpenproletariat”（流氓无产阶级）的本义进入日语，然后在日常使用中引申为失业的游民。无法无天的社会氛围，在“捉贼”游戏和“戴手铐”游戏中得以再现。据说，“捉贼”游戏取代了最为普遍的捉迷藏。梦想一夜暴富的社会心理，在抽奖游戏中体现出来。可以想见，当时的儿童游戏还包括买吃食的游

戏，即离家去寻找能吃的东西。⁴⁹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战后物资短缺的灾难，加上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持续了 4 年多，
历时比太平洋战争本身还要长。尽管经济混乱是这场有勇无谋的失败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战后灾难的久拖不决，主要是日美双方政策失误与彻底的腐败和经济破坏所致。政府通过发行“新日元”、强行控制工资和物价以及推行“产业优先”将重建贷款向战略产业倾斜来抑止通货膨胀的企图，不幸被证明十分欠考虑。当战胜方犹豫不决，拖延最终决定并执行他们主张工业复苏和推进经济“反垄断”的既定方针时，资本家和企业经营者也逡巡着不愿对生产设备进行可能毫无指望的再投资。而当司法体系每年因小偷小摸将一百多万人送上被告席之时，绝大多数投机的资本家、前军官、腐败的政客和有势力的黑帮老大却彻底操纵着这一体系，并且从免税的黑市买卖中获益最多。

尽管通货膨胀的趋势，在 1942 年底就已经首次显现，但是直到战争的最后数月，花费庞大资金为预期的日本本土“决战”备战时，通货膨胀才超出控制。理论上说，当战争结束时，1945 年的军事财政预算（1945 年 4 月至 1946 年 3 月）还有 7 个月的余额。事实上，在天皇宣诏投降时，这笔预算的大约 70% 已经支出。剩余的 30%（总计 850 亿日元军事预算中的 266 亿日元），在占领军抵达之前就被仓促花掉了，主要是支付给了军事承包商。⁵⁰

军用资金和供给物向私人手中的转移，事实上开始于天皇玉音放送的前一天，并经历了数个不同阶段的发展。8 月 14 日，铃木贯太郎内阁集体辞职之前的最后行动之一，就是同意将所有军用物资移交给地方部队的司令官处置。这项决定，第二天在军队内部以《陆机第三百六十三号》秘密指令的名义发布，规定战争供给应当分发给地方政府、群众团体、私立工厂以及市民个人。命令规定，“作为原则”，这些物品应当免费拨付给地方政府，在其他情况下则进行出售，但是“物品出售无需立即付款”。

8 月 20 日，美方在马尼拉向日方投降代表团递交的《一般命令第一号》中，明确表示所有军用物资需原封不动地封存。直到麦克阿瑟原定

到达的前两天，这一命令始终被东久迩宫新内阁所忽略。直到此时，尽管秘密处置的命令被取消，日本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确认或者找回已被处置的军用物品。毋庸多言，关于它们的去向没有什么可以查询的记录。在同一时期，日本银行正致力于为往昔的战争供货商们提供大笔贷款，其公开的理由是为了促进他们军转民，向“和平”生产过渡。从对这些行为的事后调查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天皇玉音放送后动荡骚乱的两周内，一大批权势人物将自己绝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用于掠夺军需仓库，从军事预算或日本银行手中向承包商和亲信们匆忙支付款项，以及销毁文件。在日本历史上最危难的时刻，少有文官武将或者主管经理，真诚而富于远见地投身于为普通大众谋福利的事业。在这些旧日的精英之中，未曾出现一位仁人志士、英雄人物或者值得称道的政治家。

据事后估算，日本保有的大约 70% 的帝国陆海军库存，在这首次的骚乱中被抢掠一空，而这些是日本本土 500 万军队、海外 300 万军队的供给储备。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投降后数月，占领军当局又天真轻信地将管理的一大部分保存完好的军需库存移交日本政府，指示用于公众福利和经济重建。这些物资中的相当部分是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而内务省继续将其委托给一个由五大财团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处置。这些物品的总价值约合 1000 亿日元。而这些物资很快也几乎消失得难觅踪迹。1947 年 8 月，1946 年担任大藏大臣的石桥湛山，向审查这些丑闻的议会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可悲地证实，“没有人知道价值 1000 亿日元的物资到哪里去了”。

当然，这些物资要么是被藏到了无数隐蔽的去处，要么是直接送到了黑市。与此同时，战败促使先前封锁的储蓄存款迅速流失。战争期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保管的这些资金，曾被认为是“潜在的购买力”。它们构成的庞大资源（据有关部门估计，有 2640 亿日元）在投降后很快消耗一空，主要是进入了黑市。这种情形并非由于腐败，只不过 115 是因为普通民众不得不竭尽积蓄来填饱肚子而已。

由于战败带来的庞大的政府支出，以上这些状况愈加恶化。可以想见，其中包括的一项支出，就是数百万军民的遣返费用。然而，另外一项财政支出，使政府也感到十分意外。直到美国人抵达之后，日方才获

悉，他们将要支付占领军巨额住宅费和维持费的大半。在占领初期，这项开支令人惊愕地高达经常预算的 1/3。而这并非一次性的负担。尽管用于驻留美军的直接开支，下降到只占每年预算较低的比例，但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间，这仍然是日本政府最大的单项支出。作为一项预算项目，这些支出只得顺应占领当局的指令，委婉地掩饰为“终战处理费”，或简单记作“其他费用”。⁵¹

日本人为维持占领军付出巨大，在物质和心理上产生的后果，如何强调都不过分。1948 年，当约 370 万个家庭仍无栖身之所时，日本政府却被要求将每年预算的相当部分，用于向占领者提供住所及设施，而且要确保达到美国人的居住标准。当战争寡妇们徒劳地乞求一点救济的时候，政府却别无选择，不得不为满足美军将校将征用的私人住宅改造为“最新式”住所的愿望而付费：改造电路和管道，装潢居室，安装电话、电炉和卫生间等现代化设备，有时甚至还包括将庭院的池塘改建成游泳池的费用。⁵² 当全国铁路不堪重负，在 1945 年 12 月发生了绑在妈妈背上的婴儿因车厢拥挤窒息而死的悲剧性事件时，政府仍被要求加挂经常坐不满的专用车厢，甚至“占领军专列”，供占领军人员自由使用。很少有美国人会留意到这些“占领费”，但是许多日本人显然都心知肚明。

在官方控制物价的正规市场，到 1945 年底批发价格翻了一番，而且此后继续迅猛增长。占领第一年价格上涨了 539%，第二年上涨 336%，
116 第三年上涨 256%，第四年上涨了 127%。1946 年 6 月，一升米法定价格 2.7 日元，1950 年 3 月上涨到 62.3 日元。著名的广告歌作曲家三木鸡郎，以一首滑稽歌曲描绘出这种恶性通货膨胀的失控情形。歌词大意是，火车行驶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坐火车每到一站，都会发现橘子的价钱涨得更高了。⁵³

自然，在黑市上（有时被开玩笑地称为“自由市场”）也能观察到同样的通货膨胀曲线，但是程度更甚。如果官定价格的橘子卖光了，那普通百姓就确实只有望洋兴叹了。直到 1951 年末，政府持续对以所谓五大主食（米、大麦、小麦粉、番薯和芋）为首的 50 种“基本消费品”黑市价格进行密切调查，粗略反映出黑市的暴利状况。在投降后半年间，同一消费品的黑市价格飙升至“法定”价格的 34 倍。此后，“自由市场”物价飞涨的情形有所抑止。1946 年的后几个月，50 种基本消费

品平均比法定价格高出 14 倍。1947 年为 9 倍，1948 年下降到不到 5 倍，到了 1949 年，黑市物价约相当于官方牌价的两倍。⁵⁴

然而，生活消费品只是构成了流向黑市商品的一小部分。黑市还经营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煤、焦炭、汽油、木材、水泥、平板玻璃、榻榻米草席、生铁、钢材、镀锌钢、铜板、铝、锡、电线、电动机、肥料、化学药品（硫酸、苛性钠、苏打灰）、机油、橡胶轮胎、农机具、酒精、油漆、染料、纺织品、纸张等等。⁵⁵ 显然，这些工业品与那些将自己所种的大米和薯芋送到黑市上卖的农民毫无关系。它们从哪里来？答案很明显：从那些盗出军需物资并且隐匿它们的军阀、实业家、官僚和政客那里来。难以置信，物资匮乏持续、通货膨胀失控、工业重建萎靡不振，而黑市却欣欣向荣，原因就在于，对那些占据社会有利地位的人来说，这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买卖。

直到 1946 年，由众议院议员、内务省政务次官世耕弘一领导开展了非正式、非官方的调查，大量军需物资的流失才开始受到严厉批评。即便如此，直到 1947 年下半年，这一出卖民众利益的事件其规模之大才被 117 广泛知晓。当丑闻揭露之时，调查人员照例抱怨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上至内阁、中央官厅，参、众两院议员、臭名昭著的政治掮客和“暴发户”，下至地方上的低级公务员和警察。实际上，在黑市上出卖掠夺来的军需物资所获之利，相当一部分被用作了政治活动的资金，尤其是，当然绝不仅仅是，用在了与保守党派相关的政客们身上。

甚至到了 1947 年 6 月，当众议院姗姗来迟不情愿地成立“隐退藏物资等に关する特别委员会”时，起初所谓的调查官们仍然只被赋予有限的职权，而且没有拨发调查经费。尽管有这些阻碍存在，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加藤勘十任委员长的这一委员会，至少能够对掠夺的严重后果进行评估。当年底出版的加藤委员会著名的报告书得出结论：“那些偏离正规配给用途转移走的物资以及由此暴富的人在占领时期无处不在，像癌瘤一样威胁着这个国家的经济。”通过“隐匿物资丑闻”这类事件，作为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一的结构性的腐败，被发掘出来。

这些被人凭借地位和特权掠夺的物资显然价值巨大。毕竟，它们本来是为庞大的本土防卫部队进行长期“决战”而储备的物资。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还是可以被无限期隐匿的物资。爱国妇女为协助战争

捐赠的大量钻石和其他私人珠宝也在失盗物品之列；从海外带回的药品和稀有的贵金属钛也失盗了。调查人员想方设法追踪到的零星的隐匿物资，为公众展示了这庞大资财的九牛一毛。例如，1946年4月，在东京湾的近海发现了隐匿海中的银块。近一年后，对一家化工厂的突击搜查，查获“10吨萘、26吨苛性钠、45吨润滑油、150吨食用油、16吨工业盐、50吨钢管、50吨钢筋、30吨铁板、45台电动机，以及其他各种混杂的铁类、纺织品和橡胶制品”。尽管由于缺乏可靠的记录，无法确切计算被转移物资的规模和价值，但是据粗略拼凑的估计，1947年它们的价值可能已经超过3000亿日元。⁵⁶与当年度政府的经常预算中政府支出总额205亿日元相比，其数额之巨是显而易见的。据另一项计算，被掠夺物资总重量约为3亿吨，这当然是粗略估算，但也让人感性地了解到这些物资的实际规模，以及仅仅转移和藏匿它们所需的庞大的人员数量。尽管丑闻性质极其恶劣，然而却没有什么主要犯罪人被起诉。

显然，这些年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困境，绝不仅仅只是这宗大规模的公共财产掠夺案所造成的。由适应战争的产业结构遽然转变为非军事经济，就算是在最好的情形之下，也是一项难以实现的任务。海外帝国的永久丧失——这不是指1941年到1945年间短暂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幻灭，而是在更深刻意义上指包括朝鲜、中国台湾、“满洲”在内的北中国地区等海外领土的日本帝国体制的永久丧失——意味着日本失去了先前经济成长必不可缺的资源和市场。帝国的丧失，再加上正当海外贸易和外交关系的断绝，使事态更加恶化。甚至直到军事占领末期，日本人才获准到海外旅行。

此外，在一些重要产业比如煤炭产业方面，日本为常年的阶级和种族压迫付出了惨重代价。到日本投降时，许多最繁重的体力活，尤其是在煤矿，都是由征募的朝鲜劳工或者中国俘虏承担。当解放之日来临，他们全体都从不见天日的地狱中逃了出来。后果之一就是，日本产业重建所需的基础能源生产，持续低迷难以恢复。到1945年底，当务之急的民众营养不良问题，在工业领域有了对应的新概念“煤炭饥饿”。在许多重要产业，战败后生产能力急转直下。对于大多数产业而言，至少直到1950年，产量才恢复到1930年代中期的水平。⁵⁷

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虚脱的状态。经过长期的战争，日本人民已经

习惯了被勉励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至少，这种激励传达出一种明确的意图：人民被教导要相信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文化，相信他们“国体”的危机来自于外国军队。但是，被教导在战后的泥泞中忍受难以忍受的煎熬却是另一回事，而且议会关于隐匿物资丑闻的报告，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肉体和精神的疲弊会延续这么长时间。尽管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许多秘密人物暴得大利，他们是培育黑市的温床”，然而试图揭露丑闻和追回被掠物资的行动，在每一级政权都被¹¹⁹“诡计和合法阻挠联手挫败”。至于从掠夺物资丑行中获益的权势人物，“他们戴着民主的面具，但事实上却在黑市上昂首阔步”，在国家长期的经济混乱中狂欢作乐。

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地生根实不足为怪，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在许多政治理想主义者看来，日常生活的穷困，也为民众广泛支持进步改革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1946年3月，战后首次大选前夕，一张著名的新闻照片，成了这一困境的最佳写照。照片上民众蜂拥着在路边的货摊上购买沙丁鱼，完全不理睬站在街头临时演讲台上演说的竞选政治家。⁵⁸

然而，治疗这种悲观情绪的解药几乎无处不在。1946年初，诗人崛口大学以如下的诗行，传达出自己克服疲惫与绝望的心情感受：

国家变得
小而无力，
粮食缺乏
耻辱却多。
生命易逝
举目眺望，
高高树梢
和那天空。⁵⁹

很少有人读过这首诗，因为它发表在一本新创刊的默默无闻的诗歌

杂志上。然而千百万民众都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停止了悲叹，将目光投向明确的目标。战败激起了民众对现存权威的怀疑和公然愤怒。贫困使许多劳动者变得激进。在许多情况下，无耻的腐败唤起了有益的非难之声。讽刺的幽默因绝望而开花。每一个心情疲惫、生活破碎者的故事，同时可能都会伴随一个充满活力、希望和成功的催人振奋的故事。随着旧的警察国家对自由表达限制的消散，涌现的是真正的出版物的洪流。

120 电影工业繁荣发展。电台广播又变得活跃起来。知识分子只争朝夕地全力奔走运动。人们谈论新的“爱情”形式，无论是肉体之爱还是精神之爱，同时也谈论新的“文化”涵义。“颓废”本身，则以对旧日正统的激进挑战姿态粉墨登场。

注释：

- 1 鹤见和子对日本人在战时以及战后的体验有深刻论述，参见其 *Social Change and the Individual: Japan Before and After Defeat in World War II*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荒正人所言，见 J. Victor Koschman, “The Japan Communist Party and Literary Strategy” 一文，收入 Ernestine Schlant 与 J. Thomas Rimer 编，*Legacies and Ambiguities: Postwar Fiction and Culture in West Germany and Japan* (Washington, D. C. and Baltimo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75 – 177。当时即便是反战知识分子，也倾向于认为“既然我们已经走得这么远，那就别无选择只能奋战到死”；如参见渡边和夫日记中对一位友人的记述，《败战日记》(东京：博文馆新社，1995)，p. 39。渡边本人曾一度考虑在最终决战来临之前自杀。
- 2 《战后的新语解说》(出版社不明，1946年11月)，p. 71。此书校样上注有占领军的审查标记，现藏于美国马里兰大学 Mckeldin 图书馆 Gordon Prange 文库。
- 3 据天皇之侍从武官吉桥戒三所述，参见 Herbert Bix, “Japan’s Delayed Surrender: A Reinterpretation”，*Diplomatic History* 19.2 (Spring 1995): 211。
- 4 大阪府编《大阪百年史》(大阪府发行，1968)，pp. 638 – 642。关于粮食短缺与工场劳动者的缺勤率，参见 Jerome Cohen, *Japan’s Economy in War and Reconstr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49), pp. 197 – 198, 274, 342 – 345。
- 5 通产大臣官房调查课编《战后经济十年史》(东京：商工会馆出版部，1954)，p. 37。此处所用数据，主要是 1939 年或 1940 年的数据。
- 6 推荐食谱的完整清单，参见前引之《大阪百年史》，pp. 642 – 643。
- 7 关于当时人均摄入的热量值，参见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 败战与占领》(东京：青木书店，1990)，p. 196；读卖新闻大阪社会部编《终战前后》(东京：角川文库，1984)，pp. 122 – 123；《读卖新闻》1946 年 5 月 5 日；引用数据亦参见 John W.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p. 122。1946 年儿童平均身高较 1937 年变矮的情况，参见东京烧迹闇市を记录する会、猪野健治编《东京闇市兴亡史》（东京：草风社，1978），pp. 80 – 81；这部有关黑市研究的重要文献，下引为 TYKS。

8 平凡社编集部编《昭和世相史 卡キュメント 战后篇》（东京：平凡社，1976），pp. 55 – 56。这本有关战后通俗文化的真实辑录，下引为 SSS。

9 《朝日新闻》，1990 年 8 月 23 日。

10 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の全记录》（东京：讲谈社，1989），第 7 卷，pp. 158, 161, 212。此文献下引为 SNNZ。

11 SSS, p. 80; SNNZ 7: 161, 166; TYKS, pp. 12 – 14.

12 《朝日年鉴》，1947 年版，p. 169；《大阪百年史》，pp. 913 – 914。1946 年 1 月起，美方利用原太平洋地区的军需物资向日本输送小麦。大部分小麦被加工成了硬面包，用以补充大米配给。美方的正式援助，名为 GARIOA (Government and Relief in Occupied Areas, 占领地区治理与救济) 援助，开始于 1946 年 7 月。1948 年，此援助计划并入以企业为导向的 EROA (Economic Recovery for Occupied Areas, 占领地区经济复兴) 资金项目。这些资金是贷款而非无偿援助。由联合国管理的另一援助计划 LARA (Licensed Agency for Relief of Asia, 公认亚洲救济联盟)，曾经向全日本的小学儿童配给脱脂奶粉。GARIOA 援助不仅限于食品，还包括原棉、肥料、燃料和药品等基础物资。物资援助的具体数据通常说法不一。但是 1961 年日本通产省认定，占领期间美国对日援助总额高达 17 – 18 亿美元，其中包括 10.5 亿美元的食品，以及 511 万美元的原料和燃料。1962 年 1 月，日本同意以 15 年为期，返还 4.9 亿美元的援助；参见 Fuji Bank, *Banking in Modern Japan* (1961; *Fuji Bank Bulletin* 11.4 特别号), p. 209。当时美国的援助，对缓和日本的粮食匮乏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比日本政府同一时期为占领军支付的 50 亿美元“终战处理费”要少得多）。对日援助不仅实现了 GARIOA 计划的基本目标，即“防止饥饿、疾病传播与局势动荡（1）明显地危及占领军，与（2）持续妨碍占领的终极目的”；而且占到了日本进口总额的大部分。据占领当局的一位前经济学家估算，对日援助占 1947 年日本进口额的 77%，1948 年的 67%，以及 1949 年的 59%；Sherwood M. Fine, *Japan's Post-war Industrial Recovery* (New Delhi: Far Eastern Pamphlets #13, 1952), pp. 41 – 42, 57。据另一位 SCAP 前经济学家统计，援助物资占到 1950 年输入额的 58%；Leon Hollerm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trols in Occupied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8.4 (August 1979), p. 710。亦参见 SNNZ 7: 212, 326；前引之《战后经济十年史》，p. 58；Cohen 前引书，pp. 477 – 479, 492 – 494；U. S.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国国务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ol. 8, pp. 349 – 350；大藏省财政史编纂室编，《昭和财政史》（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8），第 19 卷，pp. 136 – 137（图表 52）。末文献为战后官方财政统计数据的基本文献，下引为 Szs。总体而言，美国对日本（乃至亚洲）的援助，远较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直接援助为少；参见 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 – 195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13 山冈明，《庶民の战后——一九四五——一九五一年 战后大众杂志に見る》（东京：太平出版社，1973），pp. 41 – 46。

- 14 讲谈社编《讲谈社の歩んだ五十年 昭和編》(东京：讲谈社，1959)，pp. 560 – 562。1945年8、9月号的《少女俱乐部》也强调说，女孩们应当继续穿着雪袜，阻挡美国大兵的性接近。
- 15 山冈明《庶民の战后》，pp. 34 – 35。
- 16 SZS 19;140, 142 – 43 (表 54、57)。
- 17 SNNZ 7;164, 166, 264, 297；高桥纮，p. 97；TYKS, pp. 65, 289；朝日新闻社编《声》(东京：朝日文库，1984)，第1卷，pp. 305 – 306。末一文献下引为《声》。
- 18 SNNZ 7;272, 301；SSS, p. 266；TYKS, pp. 62, 117；Lucy Herndon Crockett, *Po-pcorn on the Ginza: An Informal Portrait of Postwar Japan*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1949), pp. 186 – 187.
- 19 当时成年人每日摄取 2200 大卡热量的最低标准，见于日本政府 1947 年出版的首份“经济白皮书”。参见前引之《日本同时代史》，第1卷，p. 196；SNNZ 7;191, 323；读卖新闻《终战前后》，pp. 122 – 123。
- 20 《裏の裏》编集栏，1948 年 3 月，收录于山冈前引书，p. 223。
- 21 《声》第1卷，pp. 57 – 61。
- 22 《声》第1卷，pp. 268 – 269。
- 23 《国民生活と闇法令》，《トップ》1941 年 4 月号。山冈前引书《庶民の战后》收录，pp. 222 – 223。
- 24 读卖新闻大阪社会部编《终战前后》，pp. 151 – 171；SNNZ 7;114。
- 25 《声》第1卷，pp. 335 – 337；朝日新闻社编《〈周刊朝日〉の昭和史》(东京：朝日新闻社，1989)，pp. 119 – 120。
- 26 SSS, pp. 43 – 44；针对当时女性之艰难处境的记录，参见同书 p. 159。《朝日新闻》1949 年 2 月 8 日，收录于 TYKS, p. 323。
- 27 SSS, pp. 242 – 249。亦参见《声》，第1卷，p. 72；SNNZ 7;203。
- 28 SSS, pp. 162, 163, 197, 199.
- 29 高桥纮，p. 105。
- 30 前引之《日本统计年鉴》(东京：总理府)，1955 – 1956 年版，p. 477 (图表 269)，下引为 NTN。亦参见 SNNZ 7;228。
- 31 NTN 1955/1956, p. 477 (图表 269)；对照 NTN 1950, pp. 440 – 441 (图表 234)。1943 – 1947 年的动荡时期，不仅缺乏肺结核发病率的可靠数据，就连人口出生率与新生儿死亡率的数据也疏于统计。
- 32 NTN 1950, p. 436 (图表 233)。1948 年，仅公共卫生机构报告的肺结核病例，就高达 932604 例；1949 年的数据是 907462 例。
- 33 《思想の科学》1990 年 6 月号，p. 51 (注 6)。
- 34 SSS, p. 80.
- 35 John W. Dower, “Sensational Rumors, Seditious Graffiti, and the Nightmares of the Thought Police”，*Japan in War and Peace*, pp. 101 – 154；亦参见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 – 1954*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79) 一书之第 8 章 “Revolution”，pp. 273 – 303。
- 36 《声》第1卷，pp. 248 – 249。

- 37 *TYKS*, pp. 283, 304, 312; 高桥纮, pp. 106 – 108。
- 38 今日出海《集团见合いはいかに行われていたか》,《妇人》1948年7月号; 收入 *SSS*, pp. 231 – 234。还可参见鹤见俊辅编《日本の百年》(东京:筑摩书房, 1967), 第1卷, pp. 200 – 202; *SNNZ* 8:121; 金谷千都子《集团见合い》,《战后史大事典》(东京:三省堂, 1991), p. 415。有关人口数据, 参见 *SZS* 19:9。
- 39 *SNNZ* 7:275, 322。
- 40 *SNNZ* 7:275, 301; *TYKS*, p. 329。
- 41 参见著名作家志贺直哉致《朝日新闻》的信, 以及读者来信的回应; 收入《声》第1卷, pp. 107 – 111。
- 42 《声》第1卷, pp. 159, 197 – 198, 199。
- 43 《战后体验》(《人生读本》特别号, 东京:河出书房新社, 1981), p. 48。
- 44 *SNNZ* 7:248, 278; *TYKS*, pp. 226 – 227。
- 45 *SNNZ* 7:230。
- 46 *SNNZ* 7:230, 290, 294, 308。
- 47 *NTN 1955/1956*, pp. 496 – 497 (图表 279, 280, 281); *TYKS*, p. 3295。
- 48 如参见はらやすお对儿童游戏的描绘,《决战漫画集》(东京:小学馆, 1944)。
- 49 *SNNZ* 7:2, 13, 181, 217, 243, 308; *TYKS*, p. 319; *SSS*, p. 266; 《声》第1卷, pp. 293 – 294。
- 50 有关基本数据, 见 *SNNZ* 7:214 – 215。战后初期的国会议员、经济学家木村禧八郎对此事的回忆颇堪玩味, 参见三国一朗、井田麟太郎编《昭和史探访》(东京:角川文库, 1985), 第5卷, pp. 223 – 237。日本政府关于军用物资流入黑市的调查报告之英译文, 参见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 September 1945 to September 1948*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vol. 1, pp. 311 – 313, 及 vol. 2, pp. 727 – 733。亦可参见 SCAP 月度报告书 *Summation: Non-Military Activities in Japan* (由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提供文献缩微胶片) 对日本国会调查的报道, summations 27 (December 1947) – 35 (August 1948), 尤可参见 summation 27, pp. 23 – 32。除非另行注明, 以下论述主要参照后两种英文文献。对日本战后经济政策之探讨, 见本书第17章。
- 51 1946年的财政年度, 在会计程序惯例化之前, 占领军费用至少占据了一般会计预算的 1/3; 参见经济企画厅战后经济史编集室编《战后经济史(经济政策版)》(东京:大藏省印刷局, 1960), p. 73。此后, “终战处理费”在1947年占到经常预算的 2/5 (39.8%), 1948 年则占约 1/4 (23.9%)。1949 年到 1951 年的这一数据, 分别为 17.1%、18.4% 与 14.1%; 参见通产大臣官房调查课编《战后经济十年史》, 附录, p. 15 – 17。占领军庞大的费用问题, 以往经常被忽略, 可参见 *SZS* 19:186 – 187 (图表 71); 《朝日年鉴》1951年版, p. 374; 渡边武《占領下の日本財政覚え書き》(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 1966), pp. 42 – 43; 前大藏省官员个人的有关回忆, 收入未公开发表的《战后财政史 口述资料》, 尤可参见第1卷, 条目 2 (p. 30), 3 (p. 17), 5 (pp. 11, 15 – 16), 6 (pp. 28 – 29)。“经常”预算不同于补充预算。
- 52 尽管日本当时的居住条件对美国人而言确有不便之处, 见 Russell Brines,

MacArthur's Japa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48), pp. 295 – 296。1948 年日本无住房家庭的情况，参见前引之《战后体验》，p. 64。

53 SZS 19:42 – 43（图表 12），当时的物价指数，参见 19:52 – 54（图表 17 – 1, 17 – 2）。亦可参见山冈《庶民の战后》，pp. 34 – 35；参见三国、井田编《昭和史探访》中三木鸡郎的文章，第 5 卷，p. 285。

54 SZS 19:64 – 65（图表 22）；《毎年年鉴》1949 年版，p. 536。

55 SZS 19:58 – 61（图表 20）。

56 有关隐匿物资的价值及规模的粗略数据，是依据国会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中各处提到的数字推断而来。在当时的混乱状况下，官方数据的可信度不高。就隐匿物资丑闻而言，大规模的、蓄意的隐匿行为，显然使事态更为复杂。同时，由于恶性的通货膨胀，也不可能对这些物资进行稳定的估值。只能通过展示这些物资相应的规模，以期对丑闻惊人的程度有所认识。

57 SZS 19:90 – 93（图表 34）。

58 SNNZ 7:227。

59 载诗歌杂志《文艺册子》1946 年 1 月号，再刊于《朝日新闻》1996 年 8 月 16 日。